

中国公民身份

历史发展与
当代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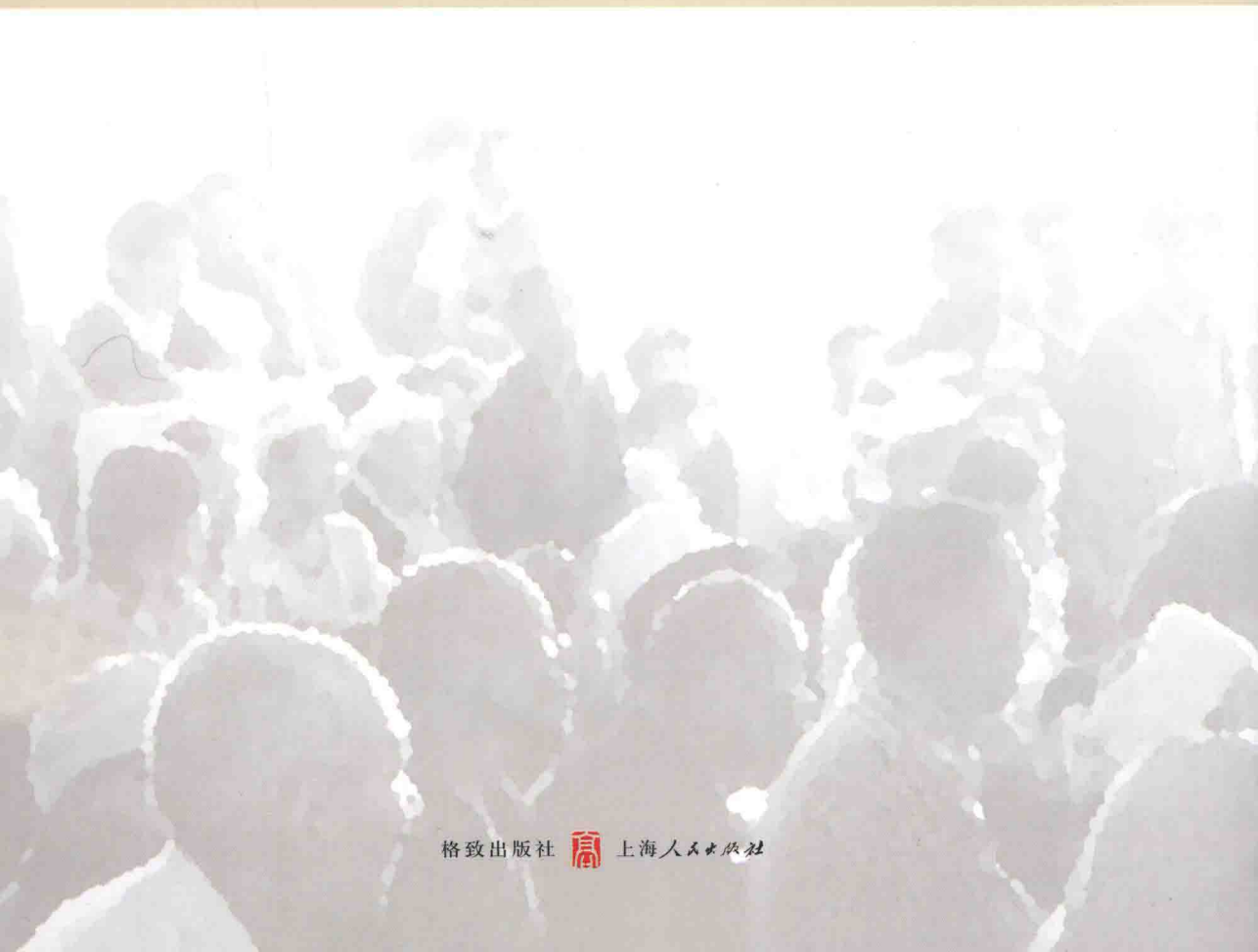
郭忠华

—— 主编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公民身份

历史发展与
当代实践

郭忠华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公民身份:历史发展与当代实践 / 郭忠华主编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5432-2377-6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公民—身份—研究—中国 IV. ①D6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6687 号

责任编辑 王亚丽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中国公民身份:历史发展与当代实践

郭忠华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格致出版 www.hibooks.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86,000
版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377-6/D·71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民身份权利与维护农民工权益研究”（批准号：10BZZ01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战略与对策”（批准号：12&ZD040）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公民身份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项目号：11JJD84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导言：从公民身份理解中国

郭忠华*

公民身份(citizenship)概念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中国人认识并有意识地追求公民身份和公民地位的时间则更短。19世纪上半叶,当国门被打开、中国被强行拖入世界民族国家的丛林之际,根源于西方的公民身份概念才开始进入中国。其时,引入这一概念的并非中国本土知识分子,而是西方传教士、旅行者等,他们在翻译《万国公法》等近代政治著作时附带引入了这一概念。当然,其目的并非要把中国变成堪与西方比肩的现代民族国家抑或公民国家,而是旨在使中国懂得世界之大势,改变中国传统之天下观念和熟悉民族国家的外交礼仪。中国人认识到公民身份的意义并有意识追求之是在戊戌变法之后。当瓜分豆剖、国运日蹙之际,逃亡日本的梁启超看到了西方公民文化对于国家强盛的意义,始产生以“立民”而“立国”的思想。此后直至五四运动,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核心的国民改造运动才成为社会风潮。然而,此运动尽管给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之风气、前所未有之变局,但毕竟浅尝辄止。此后,以集体、斗争、专政等为基础的“人民”话语和思维取代以个体、权利、民主等为基础的“公民”话语长达半个多世纪。公民身份从一种人人趋之的社会共识蜕变成一种讳莫如深的危险修辞。这种情况只有在由于改革开放而重新释放出社会空间之后才发生改变,公民身份话语才重新进入中国并受到重视:学术界不断推出以公民身份为核心的话语和思维,政治界不断出台改善公民身份的制度和政策,社会本身更是迫不及待地试验形形色色的公民参与。由是观之,公民身份建设在中国是一项未竟之工程,它命途多舛,但却生命顽强、方兴未艾。

公民身份在西方具有逾千年的历史,并且已经演化成日常生活的基本词汇,但由于其在中国的曲折经历,时至今日,其在学术界仍然是新颖的主题,普通民众对它的了解则更加有限。由此,何谓公民身份?其在西方尽管具有统一的概念,但 citizenship 后面仍然隐含着异常丰富的内涵。如通常所指的“作共同体正式成员资格”或者“国籍”之含义,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权利”、“义务”等制度性含义,或者由于对共同体情感依附而形成的“美德”等情感含义,或者由于权利或义务践行而形成的“参

* 郭忠华,政治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公民身份、政治社会学理论和当代中国政治等。

与”、“行动”等动态之含义。^[1] 但一俟此一概念来到中国,这种概念的统一性顷刻消失,含义的复杂性则充分彰显。citizenship 在汉语界被翻译成“公民身份”、“公民资格”、“公民权”、“公民性”、“公民权责”等不下十种名称。翻译的歧义既反映了译者对 citizenship 不同要素的取舍,某种程度也反映了研究者怀有的不同中国政治关怀。^[2] citizenship 含义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给翻译带来了难题,但却为理解中国政治提供了绝佳的视角。时下,以公民身份、公民资格或者公民权为角度透视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例如,部分学者主张通过赋予农民、农民工等群体以平等的公民身份来解决中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或者主张通过赋予边缘群体公民权利(包括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来解决其社会融合问题,或者主张通过公民教育来提升个体的国家认同等。这些成果为中国公民身份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同时也体现出这一概念的强大解释力。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公民身份研究需要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可以有更多的研究主题。

第一,中国公民身份的历史研究,主要体现在公民身份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及其隐含的政治发展脉络上。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以“臣民”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传统社会不仅不需要有公民身份的制度和精神,而且与之相对立。正因为如此,公民、公民身份思想的兴起意味着中国政治现代性追求的开始,公民身份概念在中国的曲折经历反映了中国政治之指导思想乃至路径变迁。当然,在这一总体线索下,隐含着许多更加细致的主题。例如,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引进起源于西方的 citizenship 概念的? citizen、citizenship 概念的翻译在中国经历了哪些阶段? 现代政治概念的引入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具有何种关联? citizenship 在近代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的兴起方式与西方原生型 citizenship 的产生方式存在哪些差异?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 citizenship 及其相关概念的译名应当如何实现最佳统一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政治发展等? 所有这些绝不是可以毫不在乎地挥之而去的问题,因为它们关联着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大主题。

第二,从公民身份角度理解当下中国的社会政治变化。市场导向的改革不仅开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而且作为一种始料未及的结果,它还开启了社会发展的空间,中国公共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公共领域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个体心理和行为等的变化上,而且体现在社会团结方式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上。普遍的国家中心和领袖崇拜已然成

[1] 关于 citizenship 概念含义的论述,可参阅郭忠华(2012a)、艾辛(2013)、希特(2007)和夏瑛(2013)等人的相关论述。

[2] 为了使 citizenship 概念更好地落户中国,笔者近年来曾就 citizen、citizenship 在中国的翻译状况及其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联进行过专门反思,参阅郭忠华(2012b、2013)。

为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平等意识、契约意识等的发展。伴随着公民心理结构的现代性调整，公民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被动或者消极的政治参与越来越成为过去，主动或者积极的政治参与越来越成为主流。不仅制度内的政治参与旧貌换新颜，而且制度外的政治参与也此起彼伏，给既有的体制和秩序造成强大的冲击。与公共领域的发展相伴随，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透明性政府等取代管制型政府而成为政治发展的新方向。如果说公民身份的含义不仅仅体现在汉语意义上的身份或者地位上，而且体现在权利、义务、参与、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政社关系等的话，那么，毋庸置疑，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很大程度都反映在了公民身份上。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公民身份这面棱镜来映照社会个体的地位变化、思想变化、行为变化、权利变化等，而且可以通过这面棱镜来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并预测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第三，东西方公民身份的比较研究。公民身份一直被看做西方政治文化的独特结晶，西方学者已经无数次宣告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不可能产生现代公民身份的精神和制度，与东方社会相适应的只能是奴役、专制和极权。例如，在韦伯(2005:27)看来，作为特殊身份资格的公民身份在亚洲城市是不存在的，不管是在中国、日本或印度，在近东则只有发育不全的萌芽；魏特夫则直接从气候角度证明中国“东方专制主义”社会出现的必然性(Wittfogel, 1957)。东方社会成为映照西方公民形象的反面镜像，东方越传统、专制、奴役、停滞、感性、野蛮和堕落，西方就越现代、民主、平等、发展、理性和文明，西方公民的肖像就越清晰。但不可否认，今日的中国、印度等曾经被典型“东方化”(orientalized)的社会都已发展出现代公民身份，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等政治价值已在东方社会生根、发芽。公民身份尽管起源于西方，但东方社会却在各自的情境下涵化和发展了公民身份的价值。东方社会的公民身份不仅有其从娘胎里带来的基因，更有其在后天演化过程中习得的大量新品质。具体到中国而言，中国的公民身份是在中西互动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带有明显的东方因素和特征，但往往为西方公民身份研究者所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正因为如此，中国公民身份的研究也就不能被西方的教条蒙蔽了双眼，而更应着眼于本土，从比较的角度看到中西方之间的类似与不同。

当然，这些只是从宏观的角度言说公民身份在中国所具有的学术空间，任何特定研究都必须聚焦于单一而微观的主题。我们或许可以从公民身份的角度理解从臣民到国民再到人民和公民的纵向个体身份演化轨迹，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脉络；可以从公民身份的角度理解市民身份与农民身份、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甚至一国两制形成的身份差异之间的制度性樊篱；可以从公民权的角度理解农民、农民工以及其他社

会边缘群体的问题缘由；可以从公民认同的角度理解中国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民族问题或者总体政治整合问题；可以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理解当今中国出现的此起彼伏的社会抗争现象，等等。总而言之，公民身份是一个复合的视角，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复合的思路，而不会仅仅集中在某个单一的方面。本文集的结构反映了公民身份的这种特征，它既包含了中国公民身份的历史演化，又重点考察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公民身份实践，同时还聚焦于农民、农民工等特定社会群体，理解其公民权利、公民认同等的建构方式。

具体而言，第一组文章主要从纵向的角度考察了公民身份在中国的兴起、曲折和再生。郭忠华教授的论文《中国公民身份的兴起与国家建构》从“翻译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分析清末民初西方 citizen、citizenship 概念最初传入中国的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现代国家建设目标。其研究结论表明，知识分子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翻译并没有遵守通常意义上的“信、达、雅”等守则，而是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出发，有意识地吸收和改造它们在西方语境下的含义，形成了适应中国政治现代性追求的新语义。概念的本来语义以及基于特定语境而形成的政治目的共同决定了它们在中国的新语义。通过对 citizen、citizenship 含义的梳理，该文表明，其在 20 世纪初汉语界分别经历了“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语义变化，折射出知识分子所想象的两种不同国家观：一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集权主义国家观；另一种则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家观。

但恰如郭忠华论文所言，20 世纪初开启的“国民改造”工程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新思维的传入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加剧，以阶级、政党、斗争、专政等为基础的另一套完备话语取代公（国）民话语而成为政治话语和实践的主流。李海金教授的论文《身份政治：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探讨了阶级身份是如何敲开中国社会的坚硬外壳而深入社会甚至是个体的心灵深处，形塑其身份、认同和行为的。该文不仅分析了阶级身份得以展开的逻辑和机制，而且还深入剖析这种身份转变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学后果。它表明，随着阶级身份取代原来的社会身份而重新将个体固化，不仅原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变得烟消云散，而且还催生出个体新的政治认同和行为方式。20 世纪初的国民改造运动并没有进入作为中国社会之基础的乡村，乡村一如往昔地为传统社会团结纽带所主宰。阶级话语展现了其所具有的渗透力和破坏力，它摧毁了在中国已延续数千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基础，使社会个体惴惴地生活在一种前所未闻的新型秩序中。但无论是传统身份话语还是稍带现代色彩的阶级话语，都与公民身份的话语和精神相去甚远。传统社会是一种以传统血缘为基础的精英社会，阶级逻辑主导下的社会没有走得更远，它只不过是在破坏这一基础的同时，将传统社会结构的逻辑颠倒过来，用底层来统治精

英罢了。两种社会形态所贯穿的都不是现代公民身份的逻辑。

如果说李海金论文集中反映了 20 世纪中期阶级身份的展开逻辑和运作机制,那么,雅诺斯基的《中国的公民身份与公民团体:对权利和公共领域的述评》则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身份、公民团体的重新兴起及其与西方的异同。贯穿该文的线索主要有两条: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身份权利(citizenship rights)的发展状况;二是中国公民团体和公共领域的发展状况。它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不过,其他二者较之政治权利的发展更加迅速,较之于西方和日本等东亚国家,中国的公民身份权利则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公民团体和公共领域也得到快速成长,这主要体现在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以及网络等公共话语平台的兴起上。但较之于西方的公民团体和公共领域,中国体现出明显的社群主义而非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色彩。以我国当前的话语模式衡量,该文尽管存在着诸多可商榷乃至批评之处,但其具有的启发性不容忽视:在中国分析公民身份和公民团体问题,显然不能忽视作为传统遗产的儒家文化,不能忽视作为领导核心的党的力量。只有将这些因素与中国公民团体成长的事实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的公民身份发展路径和发展前景做出准确的分析。

接下来的一组论文聚焦于当代中国的公民参与,分析公民参与的研究状况以及当前中国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公民参与模式。吴方彦博士的论文《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社会抗争》对非制度性公民参与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该文的特色在于超越从公民个体角度研究社会抗争行为的一贯做法,把国家作为研究的视角。通过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三个层次的分析,该文表明,随着社会抗争形式的不断翻新,政府出于“维稳”目标而形成的应对手段也相应增多,“维权”与“维稳”的不同追求构成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逻辑,政府体制特性与社会抗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抗争性政治参与已成为当代中国不容忽视的现象,它不仅反映了公共领域发展基础上的新要求,而且反映了既有体制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如何疏导由抗争所带来的压力,变体制外政治参与为体制内政治参与,这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新课题。

在这一问题上,肖滨教授的论文《网络公民参与与政府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网络已成为当代公民参与的重要平台,公民可以通过何种方式问政、问责于政府?政府又可以通过何种方式问计、问策于民?围绕这两个问题,该文展示了政府与公民团体在网络平台上的双向互动过程。该文以广东省河源市的网络参与为例,围绕“谁在问政”、“问什么政”、“向谁问政”、“问政能否得到保障”等问题,解析了当前网络公民参与的基本模式。接下来,以政府作为分析的端点,围绕“政府回应的流程”、“回应的

数量”、“回应的质量”以及“配套奖惩”等问题,考察了政府对网络公民的回应。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该文将网络公民参与现象上升为理论总结,概括了公民参与形式的性质、形式、意义和限度。肖滨教授的论文表明,当代汹涌澎湃的网络公民参与浪潮并不足惧,转型政府理念,对之进行合理的引导,政府与公众或公民团体之间完全可以形成良序的合作关系。

网络尽管给公民参与提供了便捷的平台,但毕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如参与主体的变动性、参与话题的瞬时性以及参与方式的非面对面性等。网络存在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那就是,当今诸多公民参与并非是出于自身利益追求而卷入其中的。那么,人们是如何卷入公共参与事件的?黄冬娅教授的论文《人们如何卷入公共参与事件?》对此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中的公民参与进行分析,该文表明,单纯的人际交往网络或者网络平台都不足以使人们卷入公共事件,网络的公共关注和公共话题能否转化为现实中有影响力的公民参与,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线下的联络和动员机制。黄冬娅教授的论文一方面推进了单纯以网络作为公民参与视角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又推进了单纯以人际关系网络来分析公民参与的情形,它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展现出当代中国公民参与的新特点。

第三组论文集中于农民、农民工等特定主体的公民身份研究,分析其身份认同、权利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围绕农民、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制度的视角上,认为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造就了他们的问题。同时,把“城市化”作为解决农民、农民工公民身份的出路,城市公民身份成为农民、农民工的理想图景。这一组的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话于此种陈旧思路。郭台辉教授的文章首先批判了制度主义的内在不足,认为农民工身处由企业、城市和国家所构成的三元压迫逻辑中,这种不正义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农民工的行动方式,那就是针对企业、城市政府和国家这三个依次扩大的空间范围进行抗争。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权利数量是由其行动塑造的。农民工在这三个层次上的行动造就了其差序化的公民身份结构,即企业—城市—国家这一依次扩展的公民身份结构。郭台辉教授的论文为我们展示了一种高度理论化和理想化的农民工公民身份图景。

相比而言,孙频捷博士的论文则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更加经验化和异质化的农民公民身份。该文以上海市郊的城市化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城市化所带来的身份与权利、认同之间的背离关系。在许多研究者看来,随着户籍制度的废除和农民(工)市民身份的获得,横亘在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制度性鸿沟将翩然消失,中国将进入到一个表征平等的社会中(陈映芳,2003;Solinger, 1999)。但孙频捷论文的调查结论却提出,即使城市化赋予了农民与市民相同的身份,新身份的获得者仍然无法获得与普通

城市居民平等的公民身份权利，他们在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各个方面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同时，在认同方面，农民身份的改变反而造成其政治认同“下移”而不是“上移”，即村民不是更加认同城市或者国家，而是更加认同村庄共同体或者村委会，认同的“属地化”现象愈加明显。如果说郭台辉教授的论文偏向于把身份、权利和认同看做一个由行动所塑造的同步发展的复合体，那么，孙频捷博士的论文则使我们看到这三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背离关系，使我们看到农民身份的市民化并不能解决现存的城乡隔阂问题。

本文集的第四个主题集中在中国的文化公民身份上。即使在西方公民身份研究领域，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都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于中国公民身份研究而言则更是如此。但话题的晚近性无损其内含的重要性，对于个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权利而言，对于移民和少数民族等群体来说，文化公民身份甚至比政治公民身份更加重要。在当今移民浪潮支流四溢的全球化时代，文化公民身份的重要性愈加不容忽视。本文集选编了王苍龙博士的论文《当代读经教育中文化公民身份的塑造》，探讨中国读经教育中凸显的文化公民身份。没有谁可以否认，中华文化的精髓植根于儒家思想中，同时，儒家伦理又寓居于儒家经典中，诵读儒家经典是塑造个体文化身份和认同的最重要途径。但是，这一流传了近两千年的传统随着中国现代性工程的展开而遭到批判和唾弃。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激荡以及传统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东亚诸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被重新发掘。王苍龙博士的论文以某地读经学堂作为分析个案，解析读经教育中中国文化追求和国家教育体制之间的互依和张力。文化主义的话语旨在通过读经运动来塑造个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定位，但体制内教育凭借其自身的地位和资源而在公民教育中处于主导地位，从而造成私塾和读经学堂有限的发展空间。读经运动是求诸儒家文化来重塑个体身份认同的一种努力，无论其遇到多大的阻力，都表明了中国文化公民身份领域某些不容忽视的现象。

中国的公民身份建设能否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本文集的最后选编了龚浩群教授的论文《社会变动之林：当代泰国公民身份的重构》，冀以他山之石而成中国之玉。该文以泰国密布的丛林作为分析对象，透视它在重塑公民身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贯穿该文的线索实际上有两条：一是丛林佛教对泰国文化公民身份的重塑；二是十月事件和“后 1973 意识”对泰国政治公民身份的重构。与中国的情形类似，随着泰国跨入世界民族国家的行列，科学主义、资本主义等成为国家运作的主轴。但是，作为传统文化基础的佛教以及以平等、权利为指向的政治追求并没有停止，它们隐入丛林，在丛林中开辟文化认同、身份建构和权利争取的空间。丛林是一种挑战现代文明和主流社会的力量，它在主流社会有关身份和认同的

界定之外提供另一种声音和选择,同时,围绕丛林的管理权等问题,丛林成为争取各种公民身份权利的空间。丛林是泰国公民身份生存的另一种力量,泰国公民身份正是在这种“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模式中被塑造成形。

本文集是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两次公民身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第一次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学系于2010年合作举办的“公民身份、公民社会:世界主义的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次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与美国《公民身份研究杂志》(*Journal of Citizenship Studies*)于2013年合作举办的“东方社会的公民身份”国际学术研讨会。它们的召开不仅促进了国内学者与国际公民身份研究者的交流,而且还提升了公民身份问题在国内的研究和传播。我感谢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莫里斯·罗奇(Maurice Roche)教授和英国开放大学恩靳·艾辛(Engin Isin)教授在筹办和组织这两次研讨会的过程中所提供的大量帮助,整个合作是一种充满信任的过程。感谢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约翰·基恩(John Keane)教授、美国肯塔基大学托马斯·雅诺斯基(Thomas Janoski)教授、英国苏萨克苏大学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等诸位教授,他们的参与不仅带来了国际公民身份研究领域的一流思维,而且反映了国际公民身份研究的最新态势。同时感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肖滨教授、马骏教授、郭巍青教授、岳经纶教授、谭安奎副教授、王清副教授、夏瑛博士以及华南师范大学郭台辉教授等诸位同事。他们不仅积极地两次参与会议的组织过程,而且为会议带来了国内公民身份研究的最新成果。公民身份是现代政治的灵魂和基础,我期望它能够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提供健康的精神和坚实的基础。

郭忠华

2014年10月

参 考 文 献

- [英]恩靳·艾辛:《变动中的公民身份》,载肖滨主编,《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郭忠华等译,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
- 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 [英]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郭忠华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 郭忠华:《变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概念内涵与变迁机制的解析》,《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 郭忠华:《清季民初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想象:以 citizen, citizenship 汉译为中心的论述》,

《南京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

郭忠华：《翻译中的话语建构：关于 citizen、citizenship 汉译的述评》，载肖滨主编，《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格致出版社 2013 年版。

[德] 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夏瑛：《当代西方公民身份研究：概念与理论》，载肖滨主编，《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格致出版社 2013 年版。

Wittfogel, Karl A. 1957.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Solinger, Dorothy.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目 录

导言:从公民身份理解中国	1
--------------------	---

一、中国公民身份的兴起与曲折

中国公民身份的兴起与国家建构 郭忠华	3
身份政治: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	
——对土地改革时期阶级划分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李海金	25
中国的公民身份与公民团体	
——对权利与公共领域的概述 托马斯·雅诺斯基	50

二、当代中国的公民参与

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社会抗争?	
——对当前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的述评 吴方彦	83
网络公民参与与政府治理	
——基于对广东河源市网络问政的分析 肖 滨	96
人们如何卷入公共参与事件?	
——以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中的公民参与为例 黄冬娅	109

三、农民工公民身份研究

农民工群体的行动、认同与权利三位一体	
——公民身份的分析框架 郭台辉	139
市民化、公民身份与身份认同	
——对上海市郊的城市化发展研究 孙频捷	162

四、文化公民身份

当代读经教育运动中文化公民身份的塑造	
——对一所读经私塾兴起原因的考察 王苍龙	177

五、他山之石

社会变动之林	
——当代泰国公民身份的重构 龚浩群	203

一、中国公民身份的兴起与曲折



中国公民身份的兴起与国家建构

郭忠华*

现代社会的历史以民族国家的发展作为主线,但民族国家本身却是一个颇富争议的现象。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并不总是能对本民族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达成共识。20世纪是一个见证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世纪。世纪之初,知识分子译介了体现西方 citizen、citizenship 概念含义的“国民”概念,并且根据不同的情境将其与“国家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理念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不同的民族国家想象和术语移译过程中的“翻译现代性”现象。本文承接这一主题,以清季民初“国民”概念的语义变迁作为分析对象,从翻译现代性的角度探讨当时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想象。

一、翻译现代性:从 citizenship 的汉译谈起

现代性以个人、公民、民族、国家等概念的兴起为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加速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起源于西方社会的 citizenship 概念再次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主题^[1]。但迄今为止,围绕这一术语所形成的译名却显得异常复杂,同一个 citizenship 概念,被翻译成“公民资格”、“公民身份”、“公民地位”、“公民”、“公民权”、“公民权责”、“公民性”和“公民精神”等术语。面对这种复杂、混乱的情况,有些学者发出警告,认为基本术语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如果出发点错了,就很难指望研究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仅如此,甚至还会玷污和破坏本民族的语言(辜正坤,1998)。有些学者探寻译名多元化的原因,并且一直把这种原因追溯到 citizen 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最初引入(万齐洲,2011)。当然,除此之外,也出现了试图解决此类现象的诸种努力,或主张将其译为“公民权

* 郭忠华,政治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公民身份、政治社会学理论和当代中国政治等。

[1] 之所以说是重新进入中国学术界,主要是在清季民初的“国民”想象中,已经有思想家大量使用了对应于西方 citizenship 概念的若干译法,如“国民”、“公民”、“公民资格”、“国民资格”等概念。台湾学者沈松桥(2002)指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阶层……所理解的‘国民’,其实兼具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 citizen(公民)与 citizenship(公民权、公民资格)的意涵。”